

QIANBINSIXIANSHENG

Wenhuajiangzuo

Xueshu

钱宾四先生

学术

文化讲座

#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

许倬云 著

州出版集团

州人民出版社

#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

许倬云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Q i a n b i n s i x i a n s h e n g  
X u e s h u  
W e n h u a j i a n g z u o

钱宾四先生  
学术  
文化讲座

© 香港中文大学(1992)

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拥有所有版权。

本版限在中国大陆发行。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 / 许倬云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6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ISBN 978 -7-221-08121-6

I. 中… II. 许… III. 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2296 号

责任编辑: 朱智毅

装帧设计: 瀚清堂设计

#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

作 者: 许倬云

---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电子邮箱: guojian57@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50×1168mm

印 张: 4.875

字 数: 6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221-08121-6 / K·1028

定 价: 16.00 元

# 迎许倬云教授到新亚书院讲学

林聪标

新亚书院的创立是基于几位创校先贤对高等教育的理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创校初期筚路蓝缕,经济物质条件极端贫乏,在“手空空,无一物”的环境下,他们仍然以“千斤担子两肩挑”的豪情,为继承中华传统,以发扬及创新中国文化伟大抱负为己任。钱宾四先生创建了新亚书院,并且担任了十五年的院长,为新亚书院的发展奠下了一个长久垂远的基础,也在香港高等教育史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金耀基先生在任新亚书院院长期间,为发展新亚传统特色,构想多种推动长期性学术文化活动的计划;其中以设立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学术讲座”为首要目标,并发起“新亚学术基金”的筹募运动。在多个学术讲座的构想中,首先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首次讲座,于1978年10月12日举行,当时邀请钱宾四先生由台湾来港亲自主持。讲题是:“从中国历史来谈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连六讲,成

为当时学术界一大盛事。

本讲座自 1978 年举办以来，已达十届。先后有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先生，小川环树先生，狄百瑞 (Wm Theodore de Bary) 先生，朱光潜先生，陈荣捷先生，杨联陞先生，余英时先生，刘广京先生，杜维明先生。每届讲座，不但是新亚以至中大的校园盛事，也是香港学术界的盛事。

今年适值钱宾四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很难得邀请到与钱宾四先生同乡的著名当代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来校主讲。许先生自幼即深受宾四先生启发，在学术观点上，对宾四先生特别仰慕推崇，不仅是当今学术界的适当人选，而且更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

许倬云教授，江苏无锡人，1930 年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中学就读于无锡辅仁中学，承袭了江南无锡“读书切实、做事认真”的学风传统，此时即致力研读同乡前辈钱宾四先生的名著《国史大纲》，私淑钱先生，这对他日后的史学根基与治学态度有很大的影响。1953 年及 1956 年，许先生先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文科研究所；随即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在台大就学期间，许先生随李宗侗先生治社会史，李济之先生治考古学，董作宾先生治年

历、历法,劳贞一先生治秦汉史,凌纯声先生、芮逸夫先生治民族学,沈刚伯先生治西洋史;在名师的教导下,奠定了深厚的治学基础。1962年取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台湾担任史语所副研究员(1962—1967年)、研究员(1967—1970年),并任台湾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及历史研究所所长(1962—1970年)及教授(1965—1970年)。1970年应聘赴美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及社会学系教授,1983年荣任同校校聘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迄今;1980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86年获选为 Phi Beta Kappa 荣誉会员。

## 二

以学术造诣言,许先生钻研中国五千年历史,娴熟近代西方科学,学问面甚为广阔。从比较严格的学术范围来说,他是一位中国古代史家,专精周、秦、汉三个朝代。他的主要著作中有专书三种,即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先秦社会史论》)、*Han Agriculture*(《汉代农业》)和《西周史》,论文集二种:《求古编》、《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求古编》收到1980年发表的论文,以后仍不断有论著在学术期刊登载。估计他的中文著作达百万言,英文专书及论文无数,以六十岁的盛年,累积如此大量的学术成绩,可见其生命力之活泼和创造欲之旺盛。

### 三

许先生的学术论著范围以两周到两汉为主,所探讨的课题环绕着政治结构、地方力量和农业经济。周是中国古典文明完成的时代,也是传统两千年文化的基础和泉源;汉是传统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形成的时期,二千年来政治社会的基本骨架在乎其中。所以这两个段落是了解中国历史基本性质最紧要的环节。许先生曾说,他的研究范围牵涉到三种时期,一是形成期(formation),一是定型期(crystallization),一是转变期(transformation);前者见性格的发展方向,中者是特殊个性的定型,后者则为过渡的过程。这三个时期的研究,体现在许先生三种主要的专著中:《西周史》主要探讨以文化为概念之华夏民族的形成期;*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则讨论古代世界过渡到普世国家 (universal state) 和普世文化(universal culture)的过程;*Han Agriculture* 更进一步分析维持中国这个普世国家两千余年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

许先生的历史论著主要探讨中国历史上的两大课题,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力量的冲突和融合,二是农业与商业,亦即城市与乡村的互补与联系关系。近年来,他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指出亲缘团体、精耕细作与文官制度为构成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原色。许先生认为中国不像两河流域那

种以地缘为结合的方式,而中国在商代的政治单位是两种平行的系统,一是地区性的邑,一是亲缘性的族;到了西周以宗法取胜,邑变成族的附属品。周代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这个选择形成中国很大的特色,中国政团的扩大就是以亲缘的团体扩展而成的。反映在词汇上是“天下一家”,国与家不分,这种扩张可以造成普世的帝国,而这个普世的帝国是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亲缘关系的排他性很强,但中国历史可以超越这种排他性而产生“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的观念。中国以亲缘来带动扩张的需求,这是其他文明体系所没有的特色,表现在社会关系上,亲缘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因。

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精耕细作与市场经济如车之两轮相辅并行。许先生认为中国农村并非遗世孤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而是坐落在广大市场网络的小环节;透过网络的勾连,各环节互通声气。小网络汇集于小镇,大网络以城市为纲,大小环节既有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疏通的网络自然就产生物品与人力的调节作用。因此,商业未必是压迫农业的罪魁,城市也未必成为剥削乡村的祸首。他更进一步指出:

自从韦伯谈到资本主义以后,大家往往从伦理、工作意愿等方面去讨论,而疏忽了纯经济的角度。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资产化?在纯经济的角度,也就是从精耕



农业的角度来看,资金方面是分散的,不容易集中;另一方面,资金长期束缚在小块农地上。精耕细作的农业,经常需要改良土壤以维持生产力,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大量资金遂没法转化为别的东西,这是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不能单单讨论观念就忘记纯经济的因素;反之,经济行为脱不开观念,所以虽然我们谈的是农业经济、精耕细作,还是要提醒大家了解任何一个历史现象没法完全切开,都要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第 33 页)

许先生强调的另一个中国文化的基因特色是文官制度(bureaucracy)。中国的文官组织来源久远,完备、复杂的文官系统理论早在《韩非子》中就出现了。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文官制度是国家与社会斗争的制衡角色。中国的文官制度不仅有工具的合理性,而且有儒家意念渗和其中,这是韦伯在讨论西欧自 16 世纪以来的文官制度所缺少的一环。儒家意念如果只当作意念系统,可能会成为教条,任何东西若变成教条就会神秘化,走上信仰的途径,而不走理性辩论的途径。儒家意念作为目的而论,可以相当于基督教意念,是一种信仰;可是反过来讲,儒家意念并不是上天的神谕,而是经世的使命,在这点上儒家意念的神秘性并不强。从这角度看,目的

的理性与工具的理性配合,使中国文官系统在国家与社会的拉锯战中,不但举足轻重,而且成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力量,这个特色是中国以外的史学家在讨论文官制度时未能理解到的。

#### 四

自从早年运用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概念来解析春秋战国的变革期以来,许先生近三十年中努力倡导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社会史。他指点学子们注重与检讨 Max Weber, S.N.Eisenstadt, William Skinner, Charles Tilly, 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人的理论,而他本人更是应用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历史的成功例子。他常自谓“杂家”,颇有“泰山不辞土壤,河海不捐细流”的气概。方法本是双刃刀,善用可以制敌,不善用反而伤己。这些年来台湾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史学的结果或成或败,其功过得失归之个别学者的机缘,但许先生有倡导之功,则毋可否认。他的研究取向从近代中国社会史学来看是颇有意义的。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以马克思学派为大宗,许先生的努力推介新方法和新理论,多少夺回一些园地,这种力挽狂澜之功,也是不容抹煞的。

## 五

1962年许先生荣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这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生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社会变动之研究”得到海内外学术界极高的评价与赞许(这篇论文修订后在1965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即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一书,至今仍为治中国史的学子所必读的著作)。许先生在完成学位后,立刻回台湾,任职于中研院史语所及台大历史系。在主持台大历史系系务的八年间,许先生身处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仍然坚毅的抗衡权威势力,致力维护学术研究的独立自由,得以开创出台湾这二十多年来历史学研究教学的新方向,可说是厥功甚伟,弥足矜式。

在此期间,许先生一方面辅助史语所所长李济之先生与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先生,参与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中国东亚学术委员会、中美学术合作委员会的工作,为中国学术发展竭尽心力,规划国家学术发展之方略,努力把台湾的学术研究提升纳入世界的学术圈内。

另一方面,他又致力于革新台大历史系的课程与教学,开启了历史系每一断代史分由二人以上讲授的先例,这种平行与交叉的课程设计,使历史系的课程安排有了断代连贯的新义。同时透过开日本、韩国、蒙古、土耳其、越南及东南亚各

地区历史课程，注重汉民族与各周边文化圈的发展关系；更以美国、英国、俄国、印度等别国史的讲授，进一步把中国史与世界史连贯结合起来。

在推动台湾史的研究上，许先生更是不遗余力。他自己对 18 世纪宜兰地区开发史的研究，可说是一拓荒之作，他邀约方豪、陈奇禄先生，首创台湾史研究会，定期集会；并竭力争取东亚学术基金会及哈佛燕京社的资助，对日据时代台湾总督府的大批档案资料进行分类提要和整理保存工作；在台湾史研究的推动鼓舞与人才发掘培育上献替良多。时至今日，台湾史的研究已蓬勃开展，蔚为风气，则二十多年前许先生的擘画推动之功实不可没。

此外，在许先生的任内，台大历史系成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历史研究所博士班，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拥有高级学位的史学人才，其成效影响至为深远，本院逯耀东先生即是出身于台大历史研究所而取得国家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在中研院史语所，许先生更襄赞李济之先生主持《中国上古史》一书的写作计划，在这个大型计划项目下，网罗了当世名家学者，以专题撰文方式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史，开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方向，其成果已先后由中研院史语所出版，这可说是中国史学界首次大规模集体合作撰著的尝试。

## 六

在过去几年中,许先生连续利用休假期间,回台湾指导年轻一辈的学子,他先后在中研院、台大与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他的精心筹划之下,组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透过这种 workshop 密集研讨的方式,激扬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风气与水平,使国史研究开启一个崭新的趋向。

近年来,许先生更参与筹组“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并负责北美委员会的业务推动。经由这个基金会,希望把中国研究提升至国际水平,终极目标是要以中国人的力量来推展中国文化,对世界学术文化提供更大的贡献。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壮举,而许先生苦心襄赞擘画,贡献心力智慧,实在功不可没,这是很值得在此特别提出来的。

## 七

许先生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热爱祖国,关怀社会,爱生命与人生。他以超越肢体障碍的无比毅力,涵养出忧国忧世、悲天悯人的胸怀与谦逊待人的风范。他的专业是学院的历史学者,但更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承袭了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所谓“安能居牖下,白首太玄经”。中国士人一向秉持是非分明的良知,以弘毅任重的抱负自期,谋道不

谋食的气节自励,是以正言议论,以求匡救时艰。许先生论及秦汉知识分子,特别表彰董仲舒之流的理想型人物,当亦兴景行之思,而有所自我期许之义。然而历史学家往往认识有余而进取不足,此因参透世变之后,多一分悲悯便少一分激越。许先生的历史识见既然不离“温和中庸”的基调,他多年来的政论风格——不比党、不阿谀,婉而约、肯而切也就在意料之中了。这正是学术素养投射在现实生活的结果。如果对于这种温柔敦厚的谏诤之言还听不进去,要等到什么样的结局呢?

他的高足杜正胜先生引古人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以为历史学家如许先生而言,这种忧世心情尤其亲切深刻。

## 八

许先生与香港学术界素有渊源,1970年他曾应本校前校长李卓敏先生之邀请,与当代名史学家 Herbert Butterfield, William H. McNeill 两人对本港高等教育多所献替建言。他们并在香港共同主持一个讲座,阐释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交流汇通问题。此次更接受中文大学的约请,在百忙中应邀来本校历史系担任讲座教授,任教一学期,这实在是本校的荣幸,从此莘莘学子有此良机可以聆受教益,同仁得以切磋论学,诚

属难得的机会。尤可道者,许先生与宾四先生谊属同乡,在学术观点上,许先生自幼即深受宾四先生教诲启发,对宾四先生特别仰慕推崇。这次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在钱先生辞世后首度举行,我们特别约请许先生来主讲,不仅是当今学术界最适当的人选,而且在此时此地,更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 九

近年来许先生发愿从比较文化的观点与角度,努力探索中国历史的特色,并与世界历史作一综合对比,诚如他听说:

中国历史,在国内几乎是史学园地的全部,在国外则是大天地中的一个角落。其实,中国历史的时间长,史料也相当宏富,应该也是比较历史学中主要参考组之一。可惜因为现代史学是由西方史学传统发展的,中国的历史至今仍只是汉学家耕耘的土地,还未引入现代史学的主流。国内外的史学工作同仁,尚须共同努力,将中国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我自己愿为这个任务,尽绵薄之力,只盼同志日多,则中国历史可作为解释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依据。(《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自序》)

这是许先生的大愿,良可发人深省。

今天我们在此热烈欢迎许倬云先生的来访,我们非常期待许先生从比较文化的宏观观点,就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化转变所作的一系列演讲。无论就纪念宾四先生一生“为故国文化招魂”(余英时先生之语)的苦心孤诣,或就新亚书院承继中华传统、创新中国文化的理想、信念与目标来看,实在都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意义。许先生在其近作《风雨江山》的序文中,曾特别致意于此,并且祈愿中国文化有翻旧出新之一日。我们也深盼此日能早来临。

1991年10月21日

——本文由刘石吉先生撰写,文中部分  
摘录自杜正胜先生《学术与现实之间——许  
倬云的省思和关怀》一文,谨此致谢。



## 序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若干省思

自从高中时,老师吩咐我仔细研读《国史大纲》,即受宾四先生的影响。在大学进入历史系,固然由于对文史夙有兴趣,也由于从《国史大纲》看出了一些可以摸索的途径。及至宾四先生返台定居,遂更得不时向这位乡长请求训海的机会,但终究未曾有足够的时间追随左右,所得也就不如长期从学的及门弟子。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邀请我主持“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遂与此间同仁讨论了三次。三次讲演,均在补缀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仍未离开宾四先生关怀的范围。题目固在中国,视野却时时涉及世界史。为此,特将一篇前时演讲代替序文,希望读者能了解我从中国历史瞻望世界的若干观念,当有助于理解以下三篇讲稿的重点。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资料繁多。治中国史者,在中国史的范围内,有左右逢源的乐趣,也有心劳力绌的痛苦,是以中国史的园地,遂自成天地,一旦置身其中,即难得再有探首墙外的兴趣。这一个世纪内,西洋史学已经介绍于